

忆往事未付红尘

章立凡 主编

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章立凡：都门谪居录

章诒和：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戏剧家张庚

党治国：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

乱世逸民康同璧

雷震与胡适

胡适与蒋介石

陶行知与江青

章立凡：梁漱溟与章乃器

陈远：张申府——一度辉煌半生暗淡

梁培宽：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

徐庆全：胡风致乔冠华函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825.4

122

记忆 往事未付红尘

章立凡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章立凡主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8
ISBN 7—5613—3058—8

I. 记… II. 章… III. 知识分子—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462 号

图书代号:SK4N0811

记忆:往事未付红尘

主 编:章立凡

责任编辑:周 宏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厂

开 本:640×960 1/16

印 张:24. 5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058—8/I · 325

定 价:33. 80 元

目 录

陈独秀

- 陈独秀临终实录 罗学蓬(3)

胡 适

胡适与蒋介石

- 从胡氏日记看二人的交往 智效民(31)

- 雷震与胡适 聂华苓(57)

梁漱溟

- 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 梁培宽(67)

- 梁漱溟与章乃器 章立凡(76)

张季鸾

- 忆我的姑父张季鸾二三事 高 集(95)

陶行知

- 陶行知与江青 唐文权(109)

邵力子

邵力子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吴跃农(117)

章乃器

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访谈录 许水涛(129)

都门谪居录

——“文革”前的章乃器 章立凡(161)

“七君子”的大结局

——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始末 章立凡(195)

张东荪

张东荪与北平和谈 韩勤英(211)

张申府

张申府:一度辉煌半生暗淡 陈 远(227)

康同壁

乱世逸民

——记“文革”中的康同壁母女 章立凡(237)

黄万里

科学的良心

——纪念黄万里老师 党治国(267)

胡 风

胡风致乔冠华函 徐庆全(307)

张 庚

人生不朽是文章

——怀想戏剧家张庚 章诒和(319)

翦伯赞

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

——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章诒和(345)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助章士钊主编报纸,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

“翻译”，座谈时，还负责邀集、担任记录。如今，当年接受孙诗人和我采访的老人、包括我敬重的孙敬轩都已经仙逝，而保存在我手中的黑字白纸、却清楚地记录下陈独秀生前在江津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

龚灿滨回忆陈独秀

我为孙敬轩推荐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时近八旬的龚灿滨。龚老先生三十年代毕业于北大，旧时曾任过江津教育学监、江津中学校长、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无职业，整天提着个小竹篮到车站渡口卖牛肉干养活一大家子人。笔者幼时与此老同住五福街一破烂小院，彼此隔墙为邻。龚老落实政策时年事已高，被安排到黄荆街幼儿园挂一个男阿姨的名头，从未上过一天班，主要是靠上个事业单位，领一份微薄的退休金。他的儿子龚百固现在江津西郊中学任教，系笔者毛根朋友。晚年的龚老因生活窘困，不得不去县志办发挥余热，挣几文小钱以补家用。

龚老回忆说，时在国军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的同学，两人见面后，黄对龚说，陈独秀先生寄居到江津来了，我们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分，应尽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龚当然求之不得。在“郭家公馆”（今市政府对面机关家属院）的一间向西的小楼屋里，他俩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据龚说，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已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叱咤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龚二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的学者，而不像一位政治活动家。龚回忆道：“那是两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几册线装书，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两位未曾谋过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景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俩坐下，潘兰珍热情地替他俩泡上

茶。但在摆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隔了一会儿，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脸移向了窗外。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近来写点什么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仍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送《东方杂志》连载，间或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说：“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又与我同在北大共事，现时在江津开业行医，还望你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需要我尽力处，请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辞别出来后，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会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告诉他，国民党对这位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前共产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经常有人来调查他的行踪言谈。陈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竟无、高语罕、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1942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刚回乡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已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龚是北大人，说话方便

一些。

龚对我和孙回忆说：“杨庆馥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 30 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已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

潘兰珍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说，陈先生在《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 160 元钱（据笔者考证，按当时江津物价，大致能买 50 斤大米），北大同学会有时也寄点钱给他，但不固定，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陈独秀躺在床上，与上一次在“郭家公馆”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脸色更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

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虽然杨庆馥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

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

——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了。

我问:“龚老,有一个问题,我很难理解,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不愿住在已经成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而要跑到这样一个封闭得多的江津来呢?何况,从陈独秀到重庆后连篇累牍写的文章来看,仍然是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大事,绝对没有成为闲云野鹤隐士悠民的意思,他在政治上的欲望应该说还是很强烈的呀。”

龚答:“我们从陈独秀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他的好友杨鹏升与他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他舍重庆而至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二者日机已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法团都已开始向郊县转移;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县城对岸德感坝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如潘赞化(曾任安徽盐督,名画家张玉良之夫——笔者注)、邓季宣、何之瑜等都在。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已在江津城中四牌坊街开业行医,邓经常到重庆进药,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家中去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拒之门外

1938年8月3日,由重庆逆流开出的小火轮抵江津通泰门码头,恰是中午时分,赤日当顶,满天流火。因陈独秀考虑到战乱时期,不愿给朋友增添更多的麻烦,故而启程之前,他没有给邓仲纯去信通知。何况,他与仲纯绝非泛泛之交,也用不着如此客套。这样一来,自然无人接船。

登岸后,陈独秀请脚夫挑上行李,经七贤街、五福街、衙门口,一路打听,总算找到了四牌坊街邓仲纯的诊所兼住家。

“请问护士小姐，邓仲纯在家吗？”陈独秀走进设备相当简陋的门诊室，向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问道。

“邓大夫刚刚出诊去了，请问，你是……”护士打量着他。

“我叫陈独秀，是仲纯的老朋友，刚从重庆来找他的。”

护士脸上掠上了一丝惊喜，显然，她对陈独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她立即忙着让座、打洗脸水、泡茶，然后笑嘻嘻看了看陈独秀说：“我进里屋去告诉邓太太。”

陈独秀抹了把脸，顿时觉得凉爽多了。他瘫坐在长丝椅上，感到全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潘兰珍付了钱，还掏出陈独秀的烟卷，撒给两个脚夫一人一支。脚夫图这门洞里凉快一些，也就坐在门槛上抽烟、歇气。

孰料，女护士却一去不回……

潘兰珍坐在陈独秀旁边，一边和脚夫说着话，一边用手中的大蒲扇给陈独秀送去些风儿。时间久了，心绪也就有些不安了，悄悄问丈夫：

“邓先生不在家，他太太会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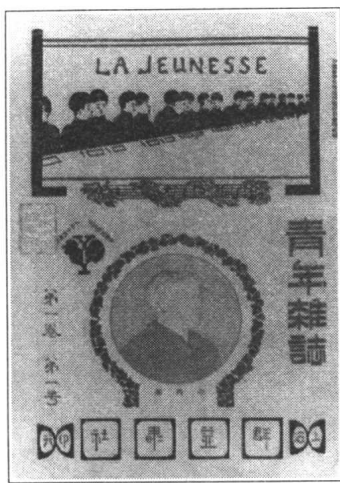
“呃，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和仲纯情同手足，邓太太是知道的，你不要担心。”

话虽如此说，陈独秀心中仍掠上了一丝不安。不由移过眼，往里面屋子瞟了一眼。一条幽黑的窄巷，直通内院。里面，依然若死水一潭。

陈独秀哪知道邓太太此时的心思？

1919年6月10日下午，正在北大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高一涵和时任北大内务部金事的邓仲纯约出门去，跑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去散发陈独秀起草并刚刚印出来的《北京市民宣言》。这一天幸好没有出事。可第二天傍晚，陈独秀又叫上高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仲纯四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吃晚饭。饭后，陈独秀与邓仲纯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则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就这天夜里，陈独秀和高一涵当场被军警抓获，邓仲纯得以逃脱。

当夜12时许，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围了箭杆胡同9号陈氏住宅。



《青年杂志》

两扇对开的木门被撞得“咚咚”响，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地打开门。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事了！

被惊醒后站在旁边围观、与高君曼同样吓得瑟瑟发抖的还有邓仲纯的妻子，这一场因陈独秀引起的惊骇使她遭受了太强烈的刺激。

陈独秀这次在狱中呆了九十多天，最后还是孙中山向徐世昌政府派出的北方和谈代表许世英施压，以及在知识界名流强大的抗议声援浪潮中，北平警察厅才同意安徽同乡会以胃病为由，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可是，为此事受到惊骇的邓太太，却老长时间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对陈独秀煞是抱怨。

陈独秀出狱后听说邓太太对他不高兴，还开玩笑似地在她面前赔过不是，并保证今后不再给她家添麻烦。

岂料，1922年10月里的一天，陈独秀又让邓夫人受到了一次惊骇。已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带着一个陌生人秘密从上海来到北平，住进了邓仲纯的家中。在夫人面前一向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的邓仲纯态度却异乎寻常的强硬，一再背着客人给夫人打招呼，除保证招待好两位客人的食宿外，还得严守秘密，千方百计确保他们的安全。连邓太太也感觉到事关重大，只好依他一次。但这两个神秘的人物整日躲在家



《新青年》

里不说，夜间还不时有人钻到屋子里与他们密谈，让她提心吊胆，好生不快。直到数日后他们悄然离去，她才从丈夫口中了解到与陈独秀一块来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头子，叫刘仁静。姓刘的是和陈独秀一道从上海出发，经北平去苏联莫斯科开会的……何况，邓太太除了害怕陈独秀给丈夫带来政治上的危险，更害怕丈夫也学着陈独秀那样风流。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是北大教授中出了名的，为这事，连高君曼也经常和陈独秀闹得打得不可开交，每次战火一起，她和仲纯总免不了过去劝架。从内心，她对陈独秀的这一恶习是看不起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丈夫要让他给带坏了可怎么办？可没想到今天陈独秀又上门来了！邓太太不仅对陈年旧事耿耿于怀，心有余悸，对今日的“党国要犯”陈独秀更是疑神疑鬼，放心不下。你陈独秀刚刚从牢房里放出来，又在报上频频发表文章攻击政府，说不定哪天惹恼了政府，又把你给重新抓进大牢，要把仲纯也给牵扯进去，我这一大家子，就只有去跳长江了！因此，前些日子丈夫与她商量，提出邀请陈独秀一家来江津同住，她开始坚决不答应，后来见一向在他面前俯首贴耳的丈夫动了三昧真火，才勉强让步。不巧，陈独秀夫妇今日上门，正逢她先生出诊去了，邓太太在里屋左思右想，与其日后受其拖累，莫如此时心一横，将他

夫妇一推了之。拿定主意，遂将护士叫到跟前，低声吩咐了几句。

陈独秀和潘兰珍在门诊室里坐了老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终于，女护士从里屋出来了。

陈夫妇一见她的神态，便知情况不妙。

女护士面带尴尬支支吾吾地告诉陈独秀说：“陈先生，真对不起……邓太太说了……她今天身子不舒服，不便会客。”

“什么？不便会客！”陈独秀大惊，瞪着双眼半晌说不出话来。

羞辱，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强烈无比的羞辱！

“小姐，你没告诉邓太太，我们是邓先生特地……特地到重庆……请来的吗？”潘兰珍也窘迫不安，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女护士目中有话地看了他们一眼，摇摇头说：“没用的，说啥也没用的。邓太太说了，她这儿房子也不宽敞，请你们另外想办法。我们太太的脾气，你们恐怕不晓得……”

陈独秀简直像兜头挨了一闷棍，怒气攻心，头晕目眩，却不得发泄。

潘兰珍也紧紧地咬着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好！我们走！”陈独秀不等护士小姐把话说完，便一声怒吼，猛地站了起来。

潘兰珍见他身子猛地一个踉跄，赶紧上前将他搀住。

临出门，陈独秀痛心疾首，冲着里屋大声吼道：“小姐，请转告邓仲纯两口子，我陈独秀宁可露宿街头，也再不会寄他们篱下！”

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跨出了邓家门槛。此时烈日当空，小街寂寥，霎那间真有天旋地转之感……怎么会这样？天下之大，难道竟无我陈独秀栖身之所么？

两位目睹了刚才那难堪一幕的脚夫倒是“见多识广”，同情地说：“先生，听你口音也是‘下江人’吧（当时四川人把避难入川的南方人通称为下江人），前面鞍子街口，也有个刚从重庆到江津来不几天的‘下江人’，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听他口音和你差不多，叫方孝远……”

“谁？方孝远！”陈独秀一听，心中骤然一松。桐城人方孝远是他的同学、旧交。他滞留在武汉德润里时方来找过他，方孝远一家人入川，还是

他找包惠僧帮忙搞的船票。那时只知他前往重庆,没想到他已经到了江津。

陈独秀立即叫脚夫把行李挑至方孝远家,一见,哈,果真是老友方孝远!

方孝远万没料到陈独秀会如此狼狈地“光临”他的寒舍,惊喜交加,马上盛情接待。庚续又叫出夫人,向这一对不期而至的贵宾问好。由此一来,陈独秀心中方觉平衡,遂将适才在邓仲纯家被邓太太拒之门外之事向方孝远详细述说了一番。

方孝远一听拍案大怒,立即要去寻找邓仲纯理论理论。

陈独秀赶紧将他劝住,说道:“算了,此事也只能怪我,倘若我离开重庆之前先给仲纯写一封信,今天的事,或许也就不会发生了。邓夫人的脾气,我是早有领教,也只怪仲纯老弟,百事皆好,惟耳朵实在是太软了一些。”

两人遂将这不快之事抛向一旁,转而谈到了时居江津的安徽人,以及老友们的近况。

至晚,方孝远又设家宴为陈独秀夫妇洗尘。方孝远知道陈独秀与正住在县城东阜门外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前清进士苏鸿怡交好,陈的学生、前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也同住一起,本想出城去将他三人请来作陪,奈何陈独秀坚决不允。

陈独秀说:“既已到了江津,朋友早迟都能见面。我现在居无定所,你这住屋也实在仄逼,我看还是麻烦你跑一趟,先帮我租上一两间屋子,有个落脚之处才好。”

晚饭后,方孝远出门去跑了一趟,很快便有了结果,江津宿绅曹茂池曹二爷答应帮忙,并在其私宅“郭家公馆”腾出一间屋子,供陈夫妇暂住。

这“郭家公馆”是旧式的几进大砖房住屋,对称形的每一进两侧都有一套正屋和起居室,全部都己经给下江逃难来江津的人租住了。过了这几进大砖瓦房住屋,有个圆形的月亮门,那里边林木蓊郁,是个小花园,花园中央,有幢西式楼房,那是曹茂池一家的住宅,东北角是一些下人住的平房。曹茂池也算得江津码头上操得转的人物,喜欢结交下江来的名

流,对“陈独秀”这三个字,当然是如雷贯耳了。马上答应将自己留着接待亲友的一间偏屋连同家具摆设全部让给陈独秀夫妇住,并慷慨地表示不收房钱。

当天晚间,邓仲纯回到家中听说陈独秀已到江津,并知他夫妇二人吃了老婆的闭门羹,怒不可遏,破天荒地与老婆干了一架,随即跑到方孝远家打听。方太太告诉他晚饭后方孝远已送陈独秀夫妇去了东门内曹茂池曹老板的“郭家公馆”,邓仲纯马不停蹄又赶到“郭家公馆”,一见陈独秀的面便负荆请罪,代老婆的无礼行为作了一番自谴,并坚请陈独秀马上搬到他家同住。

仲纯如此仗义,倒让陈独秀感动不已。但考虑到他夫妇二人刚为自己的到来而生出矛盾,仲纯虽未细说,但从他情绪上可察觉出,他或许和老婆大动了干戈。惧内的仲纯虽然此番拿出丈夫的权威将老婆硬压了下去,然他老婆此时尚在气头上,倘若现在过去,此后难免再起波澜,便坚持留在“郭家公馆”住上些日子,待他老婆气消了再说。仲纯苦劝无效,只好悻悻作罢。

数日后,稍稍安定下来的陈独秀才给尚留在重庆等候消息的三儿松年去了一信,略述了来江津后的这一段辛酸遭遇,吁嘘感慨出门之难。此信现存江津市档案馆,信中有“……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之语……

9月,待父亲在江津住定以后,陈松年也扶老携幼地来到江津,由时任九中校务部总务主任的潘赞化安排到他手下任一名低级职员。

困厄江津,龙游浅水遭虾戏

邓仲纯为此事深感内疚。直到次年3月,他在黄荆街83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一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为了弥补他对陈独秀的愧疚之情,刚搬入新居,他就再三前来恳请陈独秀也搬去同住。陈独秀始而坚辞不去,后来见他确是发乎真情,也就摒弃前嫌,举家迁了过去。院子不大,一株梧桐树漫展开去的树冠便几乎将整个天空遮罩。房子一楼一底,却很宽敞。邓仲纯与他时在九中任教的三弟邓季宣两家

人同住楼下，陈独秀夫妇及嗣母谢氏、松年一家七口人住楼上。与“郭家公馆”相比，这地方便是上乘了，四壁皆白，光线明亮，空气流通，甚令陈独秀满意。

此时的陈独秀，经济上已日见窘迫。面对一日三涨的物价，他也时感阮囊羞涩，英雄气短。而他一大家子老老少少七口人与仲纯、季宣两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经济上主要又由仲纯承担，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挨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这场风波的起因，却是季宣六岁的小儿子引起的。而邓季宣本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更是记忆犹新。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邓季宣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未刊稿）中写到：“陈独秀到江津后，就把小儿子松年送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今江津二中）总务处潘赞化那里，由潘给他在总务处安排一名最低级的职员。我那时也在九中任教。我和二哥考虑到陈家和我们邓家是世交，此时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已算是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陈独秀，觉得应该帮助他一下，所以我们就邀请陈家搬到‘延年医院’同住，也依靠我们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锅里吃饭。那时，陈独秀已经满六十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城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

“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